

古長安叢書

史念海主編

隋唐兩京叢考

辛德勇 著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
三秦出版社



古長安叢書
戊集之一

史念海主編

隋唐兩京叢考

辛德勇著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
三秦出版社

古長安叢書戊集之一

隋唐兩京叢考

辛德勇 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元市南河印製廠製型

咸阳市印刷廠印刷

陝西省新華書店經銷

32開本 6.1印張 插頁12 千字

一九九二年十月 第一版

一九九一年十月 第一次印刷

定價：

0.05元

ISBN7-80546-9/K·89

古長安叢書總序

史念海

長安作爲古都，歷史最爲悠久。長安之名，始於秦時。周的豐鎬即在其西南，秦的咸陽亦位於渭河北岸，雖少有間隔，地理因素大致相若，故言上古的史事，率應視作一體。論都城的建置，亦上溯至於周初。由西周肇始，在這裏建都的有秦、西漢、新、隋、唐等統一的王朝，而東漢的獻帝及西晉的愍帝，也曾在這裏作過較爲短暫的稽留。分裂時期在這裏建都的政權，則有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後秦和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東漢初年，劉玄和赤眉，唐末的黃巢和明末的李自成也均在這裏建立過都城。總起來說，在這裏建都的，先後有六個統一的王朝和十一個政權，共計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都城爲一代人文薈萃之地，有關都城的撰述亦較他處爲豐碩。長安作爲都城，不僅歷年最久，且山川秀麗，物產富饒，處於四塞之內，儼然天府之國，尤爲當時後世所稱道。故有關撰述亦最多。今所知者，殆以辛氏三秦記爲最早。辛氏此書不見於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志，諸志的著錄，然三輔黃圖及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有所徵引，而所記又皆秦漢都邑、宮室、苑囿地理，當出於漢時人士手筆。此後諸家撰述，接踵而起，三輔黃圖兩京新記長安

志雍錄皆其著者。

辛氏三秦記綜述都邑官室，故能巨細兼載，自成一書。而專論一方面的，也早有名家。司馬相如上林賦、揚子雲甘泉賦先後輝映。梁蕭統撰集文選，以上林賦列於散獵類中，以甘泉賦置於郊祀類內。上林爲規模巨大的苑囿，甘泉於離宮中最負盛名。兩賦對於這樣的苑囿和離宮都作細膩的描述，雖所言不免有誇大不實之處，當時長安附近建築設施的雄偉壯麗，藉此亦略可見其一斑。及班孟堅兩都賦和張平子兩京賦出，更能顯示全豹。所謂兩都兩京，皆係以洛陽與長安相提並論。東漢都洛陽，故賦京都者，不能不有所涉及。其時長安已廢不爲都，而瑰麗却仍不減當年，甚至猶能和洛陽比肩齊聲。

由於長安的山川秀麗，人物薈萃，故四方景慕，咸思瞻仰，是以遠道蒞臨，觀風俗者，時有所聞。甚至王朝更易，都城他移，仍未稍替。其履履所及，耳聞目濡，往往撰有記述，舊典新章，多能引人入勝。潘岳西征賦殆其著者。安仁爲長安令，由洛陽西行。所記雖多途中聞見，而於長安城中景物，更能不惜筆墨。當其初抵秦郊，觸目所見，「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當時長安已淪爲常邑，猶能如此富庶，當年都城的景物，略可想見。

歷來詩人對於都城長安的歌誦，尤多佳句名章。詩三百篇於國風中，列有豳風、秦風和周召二南，然於豐鎬兩京却未多所涉及。不過雅頌諸篇中，有關的吟詠，並非少見。小雅白華：「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大雅靈臺：「麀鹿濯濯，白鳥鵲鵲」，豐鎬城郊的風物歷歷如在目前。唐

代詩家歌誦長安，其詩篇的數量和內容，皆能超越前代。後世對於唐長安較之漢長安更爲清晰明瞭，這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在長安廢不爲都時，有關的撰述仍陸續見於著錄，可見長安爲世人重視的程度。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皆撰述於宋代。宋敏求時，長安猶隸於宋朝版圖，而當代建設亦有新績；程大昌時，長安已爲金人所據有，不過前代流風餘韻，並未因之或泯，故此數家著述，得爲當時後世所稱道。

這樣豐碩而又復絢麗的撰述，古長安的往事遺蹟賴以流傳和保存，值得珍視；只是由於傳世已久，間有殘缺散佚，難得全帙；即令幸存於今，由於輾轉鈔錄，魯魚亥豕的訛誤又在所難免。而古今地名復累經改易，舊蹟往往未能確指，致使前賢功績，仿佛輕擲虛耗。如何使之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當前黨和政府組織各方力量整理古籍，允爲一代勝事。古長安叢書也得在這盛世開始編纂，早日克奏膚功，是各方共同的期望。

由于前賢有關著述相當繁多，古長安叢書擬分集編纂，近人撰述亦往往有涉及古長安的，自應一併收錄，俾究心往事者，不必多所問津。初步斟酌，分成五集：

甲集、整部撰述，或後世的輯本；

乙集、專篇撰述，或由其他著作中節錄的有關篇章；

丙集、記遊撰述而未集成專著者；

丁集、詩詞歌曲、

戊集、近人專著。

如前所說，有關古長安的撰述，由於傳世已久，難免多所訛誤，且刊本較多，間有相互參差之處。故整理時，務須詳加校勘注解，俾使章節句讀的斟酌，字詞義例的闡釋，篇章段落的分析，情緒思想的反映，皆能有所顯現。這都是整理古籍的基本功夫，無容多事贅陳。古長安的有關撰述率多與地理有關。地理時有變遷，古今頗難一致。政區的增損，城池的興廢，鄉聚的分佈，關隘的建置，道路的通塞，疆場的改易，以及河流的移徙，湖泊的湮涸，植被的變化，動物的存沒，有關撰述中是不乏記載的。由於歷年較久，與現今多有違異。雖間有舊說詮釋，却難免舛訛，而輾轉相傳，治絲愈紊，更不易得其真象，前代學人於此，多力於考證，成就斐然可觀。自宜繼踵舊規，期臻完密。而長安古事，有待斟酌者尚復不少，唐代長安城內有都亭驛，長安志謂在敦化坊，徐松、董祐誠皆承其說，而未有是正，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謂在朱雀街。證以太平御覽所引兩京新記，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及續高僧傳等書，則都亭驛實在朱雀街西通化坊，與敦化坊無關。霸上為長安城東衝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既謂其地在白鹿原上，又謂在霸橋東端。後之論者多取前說，間有兼取後說，而未細究其間曲折。然證以舊書，桓溫北伐至霸上時，王猛問他為什麼長安近在咫尺，而不渡霸水？可證霸上實在霸水之東，並非在白鹿原上。這樣的考證對於解釋古長安的史事是有裨益的。古長安叢書的纂集應該在這方面多所致力。

可是所有考證並非都能了無訛誤。就以霸上而論，其所在雖有兩說，却迥然各異。白鹿原東倚霸水，地勢陡絕，高低相差，頗爲懸殊。桓溫抵達關中時，秦軍已在白鹿原上，循霸佈防，桓溫何能越水而登上原頭？其間道理，至爲明顯，稍一涉足其地，便可豁然洞曉，而一些所謂考證，尚項項喋喋，徒費筆墨，令人齒冷。其他事例亦復不少，無煩備舉。以此而論古長安史事，殆難悉其究竟。補苴不足，就必須對地理從事實地考察。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考證相對數，才能確實無誤，而且還應進一步分析說明其變化的前因後果，反映其間的一定規律。

終南山側，峪口連綿不絕。峪中率多皆有溪澗流下，匯而成川，故長安城南多水。居人引水成渠，徧於田塍，水色澄清，倒影如畫，稍加興建，便能引人入勝。唐代永安渠導漓、交之水入城，城南渠上築橋不少。石梁橫懸，即成遊覽勝地。杜甫詩中就曾一再吟詠：「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皇陂即皇子陂。皇子陂中菡萏香溢，亭亭覆蓋。以第五橋和皇子陂媲美，則其地的幽雅可以略見一斑。第五橋何在？張禮在遊城南記中提到：「今第五橋在韋曲西，與沈家橋相近」。說得相當概括，具體所在還得考覈。今西萬公路旁有東西兩第五橋村。第五爲唐代關中大姓，今村中却無姓第五者，是村名當與橋名有關。村之四周不見有橋。原來四十年前這裏僅有一村，並無公路。村之東南積水長存，不能種田。後來，填水修路，又填水建村。今日站在公路上，四面遠眺，公路高于兩側田地，路西兩村略低，路東低窪更甚。到低窪而無積水處掘起一坯土，竟有大半沙粒。顯係渠水流經的地方。第五橋當在此

處。更北有沈家橋村，村名亦以橋名。橋在何處？今公路之東約一華里處，一片柳蔭，濃密樹叢之下掩映一段水溝。溝內有水，水爲地面流淌的積水，惟淤泥甚厚。溝岸上有石欄舊址。大石早已移作他用，小石累累，排列平整，向遠延伸，岸形明顯。測量得知，原橋長約五米，寬可過一馬車。橋址在大田之中，與村無路相連。橋旁故老，娓娓敘述，唐時舊蹟，了無疑意。

遊城南記提到兩唐書記載：杜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當時，潯河由少陵原朱坡之側，迤邐流向西北至於神禾原畔。如能改變原側高地，當可灌溉更多農田。杜正倫當係因此而建言鑿河引水的。不料施工開鑿，却是川流如血。這自然是雜揉有迷信色彩。究竟如何？自須再作考察。這就要探索唐代潯水的流逕，還須考察杜固的所在。杜固位置，一說在馬崩崖，一說在鳳凰嘴。前者又有二處，一在王莽村近處的原畔，潯河邊，一在潯河源頭南山之下。揆諸地勢和川原形狀，這兩者均不可能。也許鳳凰嘴就是杜固？鳳凰嘴在彭儀村東北，神禾原上。站在少陵原向西遠望，此處正是潯河沿神禾原折西北流的地方。走下少陵原來到樊川，再近到潯河邊仰望，其東、南、北三面突出，超越原外，如同半島。以鳳凰嘴命名，十分形象。從相鄰的北新街村直北的小路可以捷便前往。這條牧羊人日久天長踩路成的小路，蜿蜒崖畔，再前則無路可行。攀緣崖上高低雜樹，穿林而上，始達其地。這是神禾原邊獨特的地形，絳紅色的土質，雜有紅色更重的小砂，更顯得獨特。所謂川流如血者，殆爲紅土紅砂隨波逐流而下，使水流成爲血色。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曾經說過：「豐水東注，維禹之蹟」。可是現在豐水北流入渭，與周時竟不相同。這應不是詩人的誤筆，而是古今有所變化。輞川爲唐時王維別業所在，其集中有題詠二十首，久已膾炙人口，而輞川因之亦有名當世。輞川有南垞北垞，王右丞集中南垞絕句：「輕舟南垞去，北垞森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現在輞川溪水已相當細小，甚至可以徒涉涉越，溪中山石磅礴，大者如桌，小者如几，如何還能行船？實地考察並非一望了事，探索其間變化的原因和過程，顯然是不可稍事疏忽的。這樣一些變化，有人爲的作用，也有自然的因素。涉及到自然的因素，就不能不和自然科學有關。這就不是文字考證所可以解決的。

實地考察是應該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實地考察離開文獻記載，就難得切合實際。文獻記載是有其不足之處的。若非出於第一手史料，就不能說沒有差錯。就是出於第一手史料，也不能說就一定確實。如果不能指出其錯誤的所在，還是不應輕易捨棄的。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對此是不宜稍事忽略的。長安多古蹟，秦漢時離宮別苑相當繁多，有關載籍也多所記述。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是相當有名的宮殿。秦漢帝王多在甘泉宮決定朝政大計，而且爲直道發軔之所。漢宣帝接見匈奴呼韓邪單于，即由甘泉歸來，宿于池陽宮，以便在長平阪上舉行接見大禮，然後回到長安，再賜盛宴。這是匈奴降附之後，單于的初次入覲，爲少有的盛典。近來有人說於乾縣泔水旁發現甘泉宮遺址，又有人說於三原縣嵯峨山下發現池陽宮遺址。甘泉宮如果在乾縣泔水旁，直道如何能在其地發軔？又如何解釋應劭所說的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嵯峨山下所謂池陽

宮，據說距漢長安城七十公里，也就是一百四十華里。則距長平阪亦當有九十里。漢宣帝怎能當天走完這麼遠的路程，並舉行有數萬人參加的接見大典？又如何解釋三輔黃圖所說的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阪，去長安五十里？據說所謂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有瓦當等遺物的發現，這些遺物上雖無文字，却和秦咸陽和漢長安城內的宮殿遺址的瓦當等遺物相同。這些遺物誠然可貴，然未能與文獻記載相互覈實，還是不足取的。長安附近離宮別苑既然很多，瓦當等遺物都應該有所發現，怎能不結合文獻記載，而冒然去確定宮殿？

整理有關長安古籍，可資借鑑和斟酌的，當非少數。前哲舊軌自宜多所遵循，然亦不能墨守成規，先後如出一轍。其間難免有所損益。這裏所不能已於言者，則為整理之時，如前所云，應作實地考察，山畔水涯，通塗絕徑，舊址遺蹟，斷碣殘碑，皆須親臨究問，得自目驗，再之以與文獻記載相勘證，而後作出相應的論斷。若坐擁書城，不出戶庭，僅以翻檢舊典為能事，殆不足以言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當世方家或不至河漢斯言也。

緒 說

隋唐長安、洛陽東西兩京規模空前，稱譽中外。對於隋唐長安和洛陽的研究也早已成爲一門國際性學問，中國、日本、朝鮮和一些歐美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兩座城市進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作爲一個地理實體和一種人類文化景觀來說，城市內部各種建置的空間關係應該是其最基本的內容。同時，圖史相因，也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條件。從人民一般文化生活的角度來看，正如徐松在唐兩京城坊考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弄清兩京城市建置，也是「吟詠唐賢篇什之助」。隨着人民經濟、文化生活的水平的提高和國際交往的日益增加、旅遊事業的迅速發展，人們了解古代都城面貌的要求將愈來愈迫切，我們有責任比古人提供更多、更準確的知識。因此，無論是對於歷史城市地理學、古都學，還是歷史學、古典文學，以及人民一般生活，研究城市建置，特別是象隋唐長安和洛陽這樣舉世聞名的古代都城的建置，都仍然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然而，與時代的要求相比，當代學者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却是十分薄弱的。

長安和洛陽兩座城市都興建於隋代，關於兩京城坊的記述也從隋代就出現了，此後直到清代，產生了許多關於隋唐東西兩京的著述，其內容可以說都是對於兩京建置的記錄和考訂。東西兩京的主要規劃人宇文愷曾撰有東都圖記二十卷〔一〕，隋煬帝的倖臣諸葛穎也撰有洛陽古今記一卷〔二〕。唐代關於兩京的著述有很多，主要的有釋彦琬在高宗龍朔元年修輯的大東京寺錄十卷〔三〕，杜寶在貞觀年間修撰的大業雜記十卷中也有相當篇幅記述了隋代洛陽的城關制度〔四〕。其中尤以韋述在玄宗開元十年寫成的兩京新記五卷最爲著名，成書後迅即流布各地，深得時人好評〔五〕，成爲隋唐兩代集大成之作。其後今傳有武宗會昌三年段成式撰寺塔記兩卷，記西京寺院；宣宗大中三年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十卷，其卷三有專節敘兩京寺觀壁畫；二書均不過就寺觀壁畫以補兩京新記之缺〔六〕。就總體而言，有唐代無出於韋述兩京新記之上者〔七〕。至北宋皇祐、熙寧年間，宋敏求又據之演爲河南、長安兩志各二十卷〔八〕。其書「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蹟，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九〕，成爲兩京新記之後的又一集大成之作。約略同時，呂大防等亦以兩京新記及舊圖爲本，於元豐五年刻長安圖〔一〇〕，但圖幅之外，僅有一簡略題記，並無詳細文字敘

述，南宋程大昌撰雍錄十卷，其體例與一般志書迥異，分爲若干小專題加以考辨，而所論多未足以稱精審，更不足以與長安志和河南志相侔。元代關於長安有駱天驥類編長安志十卷，李好文長安志圖三卷（二），洛陽則有佚名作元河南志，綜述兩京有王士點禁扁五卷，但或剪取宋志舊說，或就宋志略加發揮補充，與宋志不能相提並論。明人著述則略無足稱道者，唯明末清初顧炎武歷代宅京記二十卷徵引尚可稱瞻博，然亦僅止於兩京大略，不及城坊細委，且其書堆砌材料而未施剪裁，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清代乾隆年間畢沅等編撰關中勝蹟圖志，嘉慶時董祐誠、陸耀遹纂修長安縣志、咸寧縣志，雖然對於宋志間有補正，但基本上還是因循宋志舊說。踵宋志之後的里程碑式著述則唯推徐松唐兩京城坊考。

唐兩京城坊考敘述兩京城坊的基本體例乃一遵韋述兩京新記及宋敏求長安、河南兩志舊式，即分敘官城、皇城、外郭城建置，坊下係以廨署寺觀宅廟等項，復自爲子注，詳爲闡釋。徐松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廣泛搜集舊唐書及唐人詩、文、小說和碑志中的有關記載，參以兩京新記殘卷、佚文及宋以來有關隋唐兩京的專門著述，補入宋敏求長安、河南兩志相關城坊條文之中（三）。如果套用司馬光河南志序的話來評價徐松此書：「考諸宋志，其詳不啻十倍」，恐怕也並無過譽之嫌。

徐松在長安、河南兩志的基礎上補充了大量內容，其功甚鉅。正是由於唐兩京城坊考取材詳臻，其書方爲世人推崇備至，凡研治隋唐長安、洛陽兩城者，論其城市建置幾乎無不以此書爲基礎，對於徐松所論亦殆篤信不疑，常視同第一手史料引用，幾至有此書一出，他書俱廢之勢，這在清人著述中是十分少見的。徐松爲學固以勾稽史料排比參證見長，唐兩京城坊考也不失爲一代集大成之作。然而稍事考核，就可以發現，徐書雖體例恢弘，立意博雅，而考稽精深則有所不足，其中頗有一些不甚明晰乃至闕漏錯訛之處。

唐兩京城坊考以宋敏求長安、河南兩志和韋述兩京新記爲基礎，因此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直接逐錄宋志和韋記原文。韋述兩京新記清代初年以後國內已佚，今所見第三卷殘本係出於日本鎌倉時代節略抄寫的卷子本即日本尊經閣藏金澤文庫本。此本秘藏久不爲世所知，迄寬政文化間天瀑山人林衡獲寫金澤文庫本一冊，刊入佚存叢書，方公諸於世。金澤文庫本文字多有舛訛，傳寫刊刻之間復又增有新的錯誤。宋敏求河南志久佚，徐松所據乃永樂大典所收元河南志中逐錄宋志隋唐東都部分原文，而元河南志徐松節抄本中也有許多訛誤（二）。長安志較早的刊本今傳有明成化四年邵陽書堂刻本和嘉靖十一年李經刻本（有康海序），二者均非佳本，脫訛都很嚴重。清畢沅校刻長

安志引用有「康海刻本」即嘉靖本、明文淵閣本和一所謂「舊本」等，但其所據底本實爲成化本（二）。觀其所作互校甚少，可知所謂「明文淵閣本」和「舊本」也絕非善本。雖然徐松在移錄長安志等文時偶爾做了一些校勘，但總的來看，其工作是甚爲粗疏的。對此，前人不無指摘（三）。兩京新記、長安志和河南志中一些明顯的文字錯訛，大多爲唐兩京城坊考所沿襲，特別是長安志世無佳本，雖經畢沅幕下孫星衍等人校勘，但魯魚亥豕之誤仍舊連篇累牘，不絕於目。至於涉及官闕坊市建置的實質性問題，徐松對於兩京新記和長安、河南兩志的外錯就更罕有匡正了。唐兩京城坊考最主要的缺陷就是雖以「考」名書，而實際上却鮮有發明，多因襲舊說，不加考訂即補入新的材料，其間有考證，又多未爲精洽。

時代和個人的能力終究是有所限約的。何況唐兩京城坊考直至徐松臨終前仍在不斷修訂，加之當時也沒有今天這樣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可資憑藉，我們無以苛責於徐松，但若是徒因循其說，長此以往，各方面的研究都勢必要受到影響，也不能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知識需求。譬如，中日古都比較研究是很早就興起的一個熱門問題，也取得了相當成就，但由於有些考訂工作不够深入，相互間的比較也受到一定影響。日本平城京宮城南門制度與唐長安完全一致，但由於唐兩京城坊考的疏誤，遂使

二者迥異，就是其中的一例〔二〕。有感於此，我在讀書中每留意於有關記載，相互印證，不斷發現一些問題。本書所匯集的即是對其中一些問題的初步看法。這些看法，不僅我本人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有些也尚待考古發掘的驗證。寫在這裡，只是期望能夠有機會得到海內外方家的教誨，並冀以拋磚引玉，希望有關研究人員對這一問題能夠給以應有的重視。

【注釋】

〔一〕隋書卷六十八宇文護傳。

〔二〕隋書卷七六諸葛穎傳。

〔三〕大唐內典錄卷五。又法苑珠林卷一一九傳記篇翻譯部作彥琮撰《西京寺記》二十卷，當為同書。

〔四〕參見拙稿《大業雜記考說》，載《古籍整理與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輯。又《大業雜記》的成書年代別見宋周煒《清波別志》卷中。

〔五〕文苑英華卷六七八蕭穎士《贈韋司業書》，「僕……幼小日曾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為善作人。」又《兩京新記》撰於開元十年見《玉海》卷一六〇，宋敏求《長安志》引《新記》每後附己說而續增《天寶》以後事，頗有人為其所惑，疑韋述記作於《天寶》以後（如日人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一八二一九頁），日人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詳說一文曾略事辨證》，今觀蕭穎士書稱韋述為「司業」，據《舊唐書》卷一〇二《韋述傳》，述開元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又蕭穎士書稱「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與都」